

<<政策过程理论>>

图书基本信息

<<政策过程理论>>

内容概要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各级政府在推动经济及社会协调发展中的作用与管理手段也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新形势和新发展对中国公共政策及管理的研究提出了诸多挑战，要求尽快建立起一个高效、协调、规范、透明的公共决策和管理体系。

因此，系统地分析和研究中国各类公共政策的过程问题，比较分析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的差异，展望国际公共政策与管理研究的新趋势及中国公共政策的未来走向等，成为我国实际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密切关注与高度重视的问题。

他山之石，可以为鉴。

由美国著名公共政策学者保罗·A·萨巴蒂尔(Paul A.Sabatier)教授主编的《政策过程理论》，汇集了当前西方公共政策最具代表性的专家学者所撰写的有关政策过程理论问题的多篇文章，介绍了政策过程的阶段性方法、多元分析框架、制度理性选择框架、间断—平衡理论、支持联盟框架、政策研究中的创新和传播模型、政策过程与大规模比较研究等，并对各种分析框架进行了比较和评估，同时还对政策理论的发展和趋向进行了前瞻性的展望。

该书将对我国公共政策过程的理论研究和实际操作提供一些参考性框架。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国情、政情都比较特殊的国家而言，阶段启发法有助于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制度性的理性选择为中国实现以制度建设为中心的第二次转型，提供了一个关注具体的制度设置的模式，这一理论框架对于公共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具有特殊的意义。

多源流分析框架把政策过程看成是由行为者和过程的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三个源流组成，这为我们在日趋开放、多元和复杂的社会中关注决策的各种因素和各种影响方式、关注政策“输入”和“输出”过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间断—平衡理论框架给我们的启示是，中国在历经多重转变的过程中应当适度保持政策的延续性，实现动态平衡。

而随着当前社会阶层的进一步分化，利益群体之间的调和也就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支持联盟框架将为我们研究如何动员整个社会力量，推动各种不同的利益群体在共同的政策目标中一致行动，提供一千基本的分析范式。

在创新日益成为社会潮流的今天，政策传播理论框架，对于解释中国地方政府的创新活动以及政府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大规模比较研究通过探索跨系统的一系列自变量差异，来研究哪些差异与政策指标中的差异有关和无关，这有助于我们探讨当前影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政策的不同变量的实际作用——包括社会经济环境因素以及政治行为和制度因素在内的一系列变量。

而我们对书中这些理论及政策过程研究成果的了解和借鉴，需要结合中国本土的实际进行比较分析和应用，才能更好地推动我国政策及管理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我国政府机构的改革实践。

以上是我们翻译出版本书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政策过程理论>>

作者简介

保罗·A·萨巴蒂尔 (Paul A.Sabatier)，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环境科学和政策系的教授，同时兼任该分校“生态研究小组环境政策领域”研究负责人。

萨巴蒂尔合著了几本有关政策执行方面的著作[与丹·梅兹梅尼恩]，也在支持联盟框架方面合著了几本著作和几篇文章。

保罗·萨巴蒂

<<政策过程理论>>

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引言 第一章 寻求更好的理论 第二章 政策过程的阶段性方法：何去何从第二部分
考察政策过程中理性所起作用的另类视角 第三章 制度性的理性选择：对制度分析和
发展框架的评估 第四章 模糊性、时间与多源流分析迪斯 第三部分 聚焦于相对长时段政策变迁的分析框架
第五章 间断—平衡理论：解读美国政策制定中的变迁和稳定性 第六章 支持联盟框架：一项
评价 第四部分 大量政治系统间的政策比较框架 第七章 政策研究中的创新和传播模型 第八
章 政策过程与大规模比较研究第五部分结 论 第九章 政策过程的框架、理论和模型比较 第
十章 推动政策理论的发展关于编者和作者 参考书目 索引 后记

<<政策过程理论>>

章节摘录

在他的《建议与赞成》(Advice and Consent, 1988)一书中,德利翁比较了影响政策科学研究议程的政策阶段/过程划分这一框架的相对实力和缺点。

一方面,这些工作使得政策科学有了丰富的新内容,如波尔斯比和其他政策学者们就曾强调高度的复杂性,这是在政治科学和经济学中寻找更为有力的假设—发生模型(hypotheses-generating-models)的那些理论家们可能忽略的东西。

比如普雷斯曼和韦尔达维斯基详细设计的由经济发展局(EDA)执行的高级戏剧表演,最初部分地是为了阻止潜在的城市暴力(很显然这并不是经济发展局最初任务的一部分)而同奥克兰市合作进行了特别笨拙的芭蕾舞表演。

这些都表明了其所涉及的实际上反复无常的政策执行是什么样子的。

类似地,蒂特马斯(Titmuss)在《人才关系》中对输血政策进行的趋于规范性的比较评估,也强有力地反对那种对有逐渐成熟的项目评估标准的所谓标准化的收益——成本分析方法的依赖。

此外,对于政策过程的强调,使研究不再严格地依附于在政治科学中逐渐增多的公共行政和制度的研究,以及在经济学偏好中的准市场研究。

这样,它便有助于使一个新问题的导向视角合理化,这明显地不同于训练有素的前辈们。

不同阶段的累积分析,清楚地证明了拉斯维尔所坚持的一种包含各种学科的政策科学方法,以及不同政策阶段相互作用的效果。

最终,使政策过程框架明确地涵盖社会规范和个人价值观成为可能。

而这一点在当代政治性和经济性的考证中经常被忽视或遗漏。

但在同时,政策过程模型中对于特定阶段的分析有一个明显的滑坡趋势,因为他们引导学者们一次只关注一个阶段而忽视整个过程(deLeon, 1988)。

最终,许多政策研究者(以及政策制定者)开始将整个过程看成是一系列有明显区别的行为:首先,你界定问题;接着,由一组完全不同的行为者执行被选择的政策方案;第三步是专门评估,如此等等。同样地,他们描绘了一个脱节的、分散的而非正在进行的、连续的过程,一个从表面来看待发生的、相对短期的政策现象。

这种政策更适合于决策者快速变化的时间表,而非适合于一个既定政策的整个生命周期。

最后,对许多人来说,政策过程/阶段的映像暗示了某种线性——比如,首先倡议,然后评估,接着(如果有可能)终止——这不同于一系列能刻画出政策过程的运转和政治方面的反馈或者回归线路(比如评估能导回倡议,而不是往前进行下一步,选择、执行及评估都坚持彼此反馈)。

然而,大多数人(甚至后来的评判家)都认为,政策过程框架和它划分的不同阶段在70年代和80年代至少是较好的框架,因而占据中心地位。

对许多人来说,正是这种“传统的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Robert Nakuruma, 1987),被指称“教科书式的政策过程”(the textbook policy process)才使该框架自身基于正在出现的研究规范,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 1970)的预见性警告:除非严密地进行思考,否则范式可能会变成理解的障碍。

并且有争议的是,当政策学者们开始用他们自己的解释来理解政策过程框架,就好像这就是目标,而不是它所试图描述的条件时,以上情况确实发生了。

尽管肯定没有人会反对对观点所进行的全新陈述,但人们可以公开质疑它的基础假设。

让我们由此来检验这些评判的矛头指向。

金通试图解释为什么某些问题的议程受到决策者的注意,而另夕卜些却被忽略了。

他提出,在整个系统中存在着三种源流:问题、政策、政治。

每一个概念的界定大体上都与其他两者有所不同,并具有自身的动力和规则。

在需要决策的关键时刻,政策问题的提出者就将三者结合起来。

三者的结合使一个问题获得政策制定者高度关注的可能性大大地提高了。

首先是问题源流。

为什么政策制定者对一些问题给予关注,却对其他问题视而不见呢?这主要取决于官员了解实际情况的

<<政策过程理论>>

方法，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这些实际情况是怎样被定义为问题的，了解实际情况有三种方法。

首先，一种情况存在与否及重要程度可以用一系列指数来反映。

例如，项目的成本、婴儿死亡率、高速路死亡数目。

这些指数既可以通过例行的统计获得，也可以通过一些特殊的研究获得。

例如，一些研究经常要统计在美国有多少人没有健康保险。

指数就可以用来衡量实际情况所发生的变化，从而引起官员们的注意。

其次，一些重大事件或危机事件经常能够导致对于某个问题的关注。

波音747飞机的坠毁，会成为提高航空安全性的强有力的推动因素。

第三，从现行项目中所获得的反馈，可以推动对问题的关注。

选民的来信以及效果评价研究就是其中的两种方式。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能够转化成问题。

金通(1995, p. 110)直接指出，问题中必须包含明确的可感知的因素。

一些实际情况逐渐被界定为问题，因此比其他情况获得了更多的关注(Rochefort and Cobb, 1994)。

这是如何进行的呢?人们把情况界定为问题的方式时，会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信仰指导决策过程，将现象进行归类，并比较不同国家的情况。

其次是政策源流。

在“原始的政策鲜汤”周围“漂浮”着多种意见主张，意见主张由政策共同体中的专家们提出，政策共同体是一个包含着官僚、国会委员会成员、学者和思想库中的研究人员的网络，网络成员共同关注某一政策领域中的问题，如健康政策、环境政策等。

意见主张需要通过多种方式的试验和检验，其中包括听证会，论文和会谈等。

经过检验，一些主张保持原封不动，一些被合并为新的提案，一些则被取消。

尽管意见主张很多，但仅有少数能引起高度重视。

其中的选择标准包括技术可行性与价值观念的可接受性。

难以操作的建议生存下来的可能性较小，与决策者的价值观念不一致的建议很少被考虑采用。

例如，关于美国铁路国有化的提案在华盛顿就很难通过。

金通探讨的第三种源流是政治源流。

其中包含三个因素：国民情绪、压力集团的争夺行动、行政或立法上的换届(turnover)。

国民情绪是指在某一既定国家中的相当数目的个体都倾向于沿着共同的方向思考，并且这种情绪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

意识到国民情绪变化(可以通过民意调查方式获得)的政府官员们，通常会在议程上增加某些事项或淡化其他人的希望。

而且，政治家们经常将利益集团的支持或反对态度作为更广阔的政治领域内的一致或分歧的衡量标准。

例如，如果所有的利益集团都支持放松管制的政策，政府官员很有可能就会把这一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一旦意见相冲突，政治家们则通常会想办法维持支持派和反对派之间的平衡。

为达到这种平衡所采取的方法直接影响到该问题是否还能够继续受到关注。

除上述所提到的因素外，立法和行政部门的换届也经常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议程。

例如，如果突然有很多国会新议员有反对“大政府”的思想，那么放松管制问题则会受到广泛关注。

主要行政官员的变更也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新总统或是新内政部长的上任，标志着潜在的变化即将发生。

像削减财政预算这样的问题将会获得更多的关注，而像复杂的国民健康保险等另一些问题则会受到更少的注意。

在政治源流的三重因素中，国民情绪和政府的换届这两个因素的结合，会对议程产生最强有力的影响。

金通理论最大的特点就在于“结合”。

在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上，当上述三大源流汇合到一起的时候，问题就会被提上议事日程。

<<政策过程理论>>

金通(1995, p. 165)将这样的时间点称为“政策之窗”(Policy window),并将其定义为“提案支持者们推广其解决方法或吸引别人重视他们的特殊问题的机会”,该机会是稍纵即逝的。

这些“窗口”是由紧迫的问题或是政治源流中的重大事件“打开”的。

例如,一架飞机的坠毁将会带来对航空安全问题的关注。

在政治源流中,新的行政命令将倾向于放松管制。

“政策之窗”持续时间较短,一些可以预测,如年度财政预算安排,一些则无法预测,如地震事件的发生。

总而言之,子系统政治是平衡的政治——是政策垄断的政治,渐进主义、被广泛接受的支持性图景和负反馈过程等相协调的产物。

子系统决策过程分散在‘铁三角’,官僚机构的专家议题网络、国剑姐和利益党团之中。

直到有了政治动议、政府议程的推动以及正反馈的发生,既得利益者才会趋于打破原来的状态(不含每年预算的微小增加)。

在这个意义上,问题就扩散到国会的宏观政治系统和公共总统制之中。

宏观政治是间断的政治——其中包含大规模变迁的政治、多种竞争性图景、政治操纵和正反馈过程等。

正反馈加大了变迁的脉动:它克服了惯性并使得原有的状态发生崩溃和破裂(Baumgartner和Jones, 1991, 1993; Jones, Baumgartner和Talbert, 1993; Talbert, Jones和Baumgartner, 1995; Jones, Baumgartner True, 1996)。

美国的政策制定并不能用格式般的僵化以及紧身衣状的政府来很好地描述。

多年以来,美国政策中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变迁。

有一些变迁是渐进发生的,另一些变迁则是爆发性或是间断性地出现。

在一个问题领域处于平静时期的时候,这样的问题就不被视为一个公共问题。

即便它是一个公共问题,其政策制定也是由一个子系统(通常是一个政策垄断)完成的,并与一个被广泛接受并获支持的图景结合在一起。

但是,总是存在这样的可能,就是冲突扩散或者热情动议会导新图景的产生并吸引新的参与者。

那么问题领域就不再平静了。

它被提到议程上来,宏观政策机构就剑日以处理,并争相努力解决新的“热点”问题。

重大的政策变迁开始出现,一个或多个子系统将会被破坏,新的机构或是新计划得以诞生:“间断的平衡,而不是稳定性和墨守成规,构成了美国政治系统的特点。

”(Baumgarmer和Jones, 1993, p.236)。

<<政策过程理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